

# 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

牛力著



大学与现代中国  
◎ 主编 朱庆葆

出版社



# 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

大学与现代中国 © 主编 朱庆葆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 / 牛力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

(大学与现代中国 / 朱庆葆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14830 - 9

I. ①罗… II. ①牛… III. ①罗家伦 (1897~1969)  
—人物研究 ②国立中央大学—校史 IV. ①K825.46  
②G649.28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512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大学与现代中国  
书 名 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  
作 者 牛 力  
责任编辑 官欣欣 李鸿敏 编辑热线 025 - 8359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72 千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830 - 9  
定 价 6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序 言

朱庆葆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大学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将这一进程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sup>①</sup>。是否是“凯旋”姑且不论,但大学的扩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 (一)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源远流长。远者如起源于汉代的太学,鼎盛时期东汉太学生多达三万;近者如宋元以来的书院,讲学之风兴盛,一时蔚为风气。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梅贻琦便曾指出:“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sup>②</sup>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中,大学以及活跃于大学场域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政治的更替、民族的救亡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首先,大学是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的中心。从根本上

---

<sup>①</sup>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sup>②</sup> 梅贻琦:《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来说,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并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本职。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sup>①</sup> 强调的就是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组织特征。近代以来,在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的文化重建,是大学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罗家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sup>②</sup> 并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使命。胡适在 1915 年留学美国时也说:“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是百余年来大学孜孜以求的理想。<sup>③</sup>

其次,大学成为新兴知识分子汇聚的舞台和社会流动的新阶梯。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这种新兴的学术机构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场域。知识阶层在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学术成为一门职业,使他们在大学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致力于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而对于有着数千年以读书为进身之阶传统的中国社会,“上大学”也成为各个阶层谋求改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大学成为社会晋升阶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大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者和国家建设的担负者。大学还深度介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建设之中。大学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并有着致力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时代担当,屡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所谓“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宁”<sup>④</sup>,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和知识阶层汇聚的特征,成为近代政党鼓吹主义、发展组织、吸纳成员的重要场域。使得每一次政治变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②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18页。

③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

④ 刘伯明:《论学风》,《学衡》1923年第16期。

动,都在大学有着相应的呈现。同时大学作为国家培育人才之地,又是国家建设的砥柱中流。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应对政府的意志和需求,也深刻体现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之中。

最后,大学是推动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先驱力量。在 20 世纪上半叶国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中,大学体现出了沉毅的勇气和担当的精神,成为民族救亡的先驱。这不仅仅体现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这些重大的爱国事件,也表现为大学为推动中华民族学术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在当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是时代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 (二)

由此看来,现代中国的大学早已不再是那种潜心于学术创获的“象牙之塔”,其“担负”是如此沉重,乃至难以承受。这也使得人人都评论大学,但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缠中难得要领。

在大学与外界复杂的互动中,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在民国时期曾存在为数不少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但公立大学是现代中国大学的主体。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大学受国家政治变动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而大学对外界政治的反应和参与也显得积极且主动,卷入的程度也更为深切。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理解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现代中国大学场域的运作和交互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在现代中国,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和社会栋梁之所,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过:“后十年国家的时事就是现在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的大学教育好,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好,现在的大学教育坏,将来的情形也就会

坏。”<sup>①</sup>国家的命运和大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自于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知识训练、选择的政治立场和养成的文化主张，都深刻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则显得直接且强烈。现代中国的大学是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紧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性知识生产的需要。国家意志和政府需求深刻影响着，乃至主导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大学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怎样生产知识，培养何种人才，都紧密围绕国家的目标展开。这既有权力对知识的引导，也有大学对国家需求的主动适应。急国家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所谓“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对大学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无论是清末的忠君尊孔，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教育，抑或是此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都把大学视为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思想文化统制的主要场域。通过引导、规范乃至钳制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国家意志和党派观念对于大学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三)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从宏观上来讲，该丛书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以大学作为观察和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曾说过，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sup>②</sup>。大学不是抽象的概念、结构和组织，大学是它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体现。对于大学的

---

<sup>①</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sup>②</sup>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研究不能局限于大学本身,而要把它置于周遭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来展示大学对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都在大学接受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主张、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大学中形成。通过培育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学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难以绕开大学。不理解大学,不理解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不理解大学在知识生产、社会流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就很难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的社会变动给予深层次的的阐释和解读。

第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道路提供鉴戒。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民族文化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既需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更需要有本土情怀,继承现代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丰厚历史遗产。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学要植根中国大地,才能生根成长、枝繁叶茂。如何形成自身的大学理念、大学模式和学术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有着卓有成效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教训。这些在今天都需要给予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加以采择。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sup>①</sup>所遗传的是大学对于知识创获和文化遗产的一贯责任,而面对的则是变动的历史环境和互异的文化土壤。希望“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能以大学作为切入点,加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加深对于大学的理解,加深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理解。

---

<sup>①</sup>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 目 录

引言 .....	1
一、问题缘起 .....	1
二、学术史回顾 .....	5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9
<b>第一章 临危受命——重构大学精神 .....</b>	<b>14</b>
第一节 中央大学的解散与整理 .....	15
第二节 风潮根源探因 .....	27
第三节 大学精神的重构 .....	44
<b>第二章 治校举措与学风转移 .....</b>	<b>59</b>
第一节 大学回归学术 .....	59
第二节 为中大求师 .....	69
第三节 调整学科结构 .....	76
第四节 打造学术环境 .....	87
第五节 学风的转变 .....	95
<b>第三章 学生群体——读书与救国 .....</b>	<b>102</b>
第一节 课程整理与为国储才 .....	103
第二节 学生来源与就业 .....	119
第三节 团体生活与政治参与 .....	136
<b>第四章 教授群体——学术与政治 .....</b>	<b>156</b>
第一节 《时代公论》与参政议政 .....	157

第二节 《国风》与南高旧人 .....	171
第三节 《新民族》与抗战建国 .....	191
第四节 比较中的异同 .....	204
<b>第五章 罗家伦的困境与去职 .....</b>	<b>213</b>
第一节 罗家伦去职经过 .....	214
第二节 经费难题 .....	220
第三节 “纪纲”困扰与门户之争 .....	230
<b>第六章 校长视角下的大学与国家 .....</b>	<b>258</b>
第一节 国家意志的代言人 .....	258
第二节 “凭着学术的标准” .....	267
第三节 “为官”与“为学” .....	276
<b>结语 .....</b>	<b>286</b>
一、学术与政治 .....	287
二、知识与权力 .....	294
<b>参考文献 .....</b>	<b>303</b>
<b>索引 .....</b>	<b>311</b>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

### （一）国际视野和“中国经验”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既往的研究表明,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时代感,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著名学者哈罗德·珀金(H. Perkin)曾指出,大学正是基于历史传统在回应时代挑战中不断调适的产物。

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到被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谁都在谈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看懂大学的这些任

务究竟是什么。<sup>①</sup>

中国近代大学是模仿西方大学制度的产物,它们诞生于外强凌侮、民族危亡的时代环境之下,作为追求国家富强的“利器”被引入中国。因此从一开始,中国近代大学就担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尤其是其中的国立大学,在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它们同西方近代大学相比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模式、中国传统和时代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发展呈现为各种力量不断调适、互动影响的复杂过程。

西方近代大学的崛起和发展深深介入到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德洛克(B. Wittrock)指出,“近代大学形成的过程,正是工业经济秩序和民族国家这一最典型、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从中世纪时具有鲜明国际化特征的学者社团组织,转变到紧密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机构,大学在其“民族化”进程中,与民族国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以各种形式形成了默认的“契约”关系:民族国家为大学提供经费支持和自治保障,而大学为民族国家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在这一架构中,大学不仅为国家建设培育适应各行各业的拥有高级技能的专业人才,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推动国家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发展,而且通过唤醒民族意识、构筑民族文化,在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③</sup>

与之相比,中国近代大学借鉴了西方大学的基本概念和组织结构,其成长却根植于中国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更多是借用西方大学的概念和框架来解读、评价、批判乃至是规范

---

①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② Wittrock,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Sheldon Rothblatt and Björn Wittrock,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ince 1800: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305.

③ (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中国大学的发展,对两者间的差异重视不足。正如有的学者批评的那样,“几乎没有人把亚洲的大学放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予以分析,把他们当作一种制度来分析其内部的动作,就更少了”。<sup>①</sup> 西方大学是从中世纪自治性的学者社团组织发展而来。而在战乱频仍、国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大学首先担负着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它们和民族、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为民族生存和国家富强做贡献,是中国大学难以回避的时代责任。中国近代大学在保存了西方大学基本组织结构 and 特征的基础上,受到国家意志和政治需求的影响尤为强烈。而大学也积极参与到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之中,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存亡始终给予密切关注,正所谓是“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引自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大学的“中国经验”。

## (二) 中央大学的典范意义

在中国近代,大学是一种笼统的称谓。如加以细分,其中又有公立大学(包括国立和省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类。<sup>②</sup> 这些大学因其创“立”者不同,与国家、政府的关系颇有差异。国立大学作为近代大学的主体,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这些“名校”更是备受政学界关注。它们不仅在办学成绩上足以代表当时中国大学的水准,而且与政府“走得更近”,联系密切,交往频繁。国立大学不仅由中央政府直接创“立”,其办学经费的绝大部分也来自“国库支出”。<sup>③</sup> 与私立大学相比,国立大学受到国家政策和政治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对政治的反应

---

<sup>①</sup> 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九辑):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sup>②</sup> 在民国教育部的官方统计中,更倾向于将大学分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其中私立大学包括本文所指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

<sup>③</sup> 以1934年为例,该年度国立大学岁入总经费为1418万余元,其中来自中央国库拨款达到1222万余元,中央拨款占全部岁入经费的86%以上。而同年度私立大学岁入总经费为759万余元,其中来自中央国库拨款仅79万余元,占全部岁入经费的10.4%。见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年,第18页。

和参与也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卷入的程度也更为深切。国立大学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为考察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近代中国大学场域中的运作和交互影响提供了理想的视角。

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叙述框架,要深入理解这一框架的基本要素以及制度的内部运作,需要立足于对具体历史经验的考察。从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选取一所大学的变迁作为个案来研究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虽然不足以代表民国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全貌,但可以避免因观点的需要而在不同大学间穿插,造成对材料断章取义,甚至流于空疏的议论。立足于对具体大学的研究,从大学的历史发展来理解变迁进程,更易于把握其中的变迁轨迹以及大学受到内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就广泛认同而言,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大学的典范。及至今日,北大也近乎成为了中国大学的代名词,其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也被学者和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关于北大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远较其他大学为多。但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民国时期的北大虽然备受关注,但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随着国民政府时期首都南迁南京,作为当时首都唯一的国立大学,中央大学才是南京国民政府着力打造的“民国最高学府”。<sup>①</sup>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大学视为推进民族复兴和加强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把大学发展纳入到国家建设的轨道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扮演着重要角色。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和政府的意志,成为了该时期中央大学发展的主线和基调。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政治对这所大学的影响远较其他大学深切,中大与国家建设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对于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中央大学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在中央大学的发展历史中,罗家伦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从1932年就任,到1941年去职,罗家伦掌舵中央大学长达九年,这九年

---

<sup>①</sup> 北大学者陈平原便指出政权的转移和首都的迁移,使得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各领风骚”,其中“北京大学活跃于1898—1927年,以及中央大学领先于1928—1949年”。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也被认为是中大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在此前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大受困于经费不稳和政党风波,始终风潮不断。此后的 40 年代,中大也是校长频繁更迭、学生运动频仍。前后对比,罗家伦长校时期正是大学相对平静、稳步迈进的九年。无论是在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在政治与社会影响力上,当时的中大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最高学府”。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该时期中大历史的研究并不多,对其给予的关注和中大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以及其学术成就也不相称。

## 二、学术史回顾

本书所涉及的关键词有三:中央大学、罗家伦、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在这三个方面,学术界都分别有所研究,但对三者进行综合考察的却不多。

对大学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探讨,西方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西方近代大学在民族国家诞生和建设过程中的作用的考察。尼夫(G. Neave)通过考察 19 世纪大学的发展进程指出,近代大学的复兴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在民族国家的崛起进程中,大学被普遍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得到合法性和政权的保护。而民族国家也把大学看成捍卫国家的重要力量,并希望大学承担起民族性知识生产和巩固民族忠诚感的使命。安迪·格林(A. Green)在其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了大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根据大学与民族国家签订的“现代契约”,国家需要确保大学的安全和部分的自治,并为大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而大学要“为国家提供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人才,传播主流民族文化,向国民灌输民族意识,从而为迅速崛起的民族国家打造出政治文化共同体,以巩固主

流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sup>①</sup>这一进程,使得近代大学的崛起深深嵌入到民族国家建设之中。

尼夫等人关于近代大学与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考察,其出发点是对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回应,通过反思民族国家对于大学的影响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发展寻找出路。这一点在阎光才的《全球化:一种意识形态?——全球化语境下大学与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一文中得到了集中表述。<sup>②</sup>这种视角具备历史的纵深感,尤其是他们对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模式”和“洪堡理念”的论述,与本书的研究主题有着重要联系。罗家伦建设中央大学的思路正是学习19世纪柏林大学对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作用。这种模仿使得中西方大学模式之间具有了很大的可比性,德国大学模式所体现的理念和思路对于理解中央大学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是由于民族和时代的差异,理解中国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套用尼夫、阎光才等提出的理论框架。北大学者陈洪捷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目前为止介绍19世纪德国大学理念最为详细的中文著述,并且作者有意识地把以洪堡和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大学观与近代中国教育家的思想和办学实践结合在一起。<sup>③</sup>但此书重点考察的是蔡元培和北京大学,而没有涉及同样深受柏林大学和德国古典大学观影响的罗家伦和中央大学。

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涉足在全球背景下考察中国大学的特征,由此引发了对西方模式与中国本土经验的思考。许美德(R. Hayhoe)在《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中,从文化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大学百年历史中的中西方模式的对立、调适和交流

① (英)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

② 阎光才:《全球化:一种意识形态?——全球化语境下大学与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3期。

③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过程。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政府采取一系列控制手段将大学纳入到国家建设的轨道之中。这些举措推进了大学的“民族化”,并为今后大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sup>①</sup>许美德从比较教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大学的经典模式及其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变化,为中国大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球的宽广视野。但她并没有深入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大学的实际运行中,而是基于二手文献进行“史话”式的叙述,因而显得过于宽泛,缺乏细节和血肉。

对罗家伦时期中央大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学界同样有所论及,其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大学校史的研究,其中以2002年出版的《南京大学百年史》为代表<sup>②</sup>。校史研究在于追根溯源,既提供了大学发展历程的基本轮廓,也对史实进行了初步辨析,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校史研究多注重于大学的办学成绩、制度沿革、院系设置和人事变迁等方面的叙述,其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问题意识。而且校史多由校方组织学者编撰,出于种种原因易停留于对大学辉煌历史和校友风采的颂扬,感性有时多于理性,宣传的考虑有时会压倒学术的立场。

第二类研究是关于罗家伦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他长校中大的九年是研究的重点所在。台湾方面在罗家伦先生去世后先后编撰了《罗家伦先生年谱》、《罗家伦先生文存》、《文存补编》和《文存补遗》,尤其《罗家伦先生文存》一书耗数十年之功,资料丰富翔实,为研究罗家伦思想生平和中央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资料基础。而由于政治因素,大陆学者对罗家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且多以强调罗家伦“五四旗手”的身份为主。李雅鹃在研究中指出,罗家伦自身的自

---

<sup>①</sup>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

<sup>②</sup> 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前的校史著作包括朱斐编著的《东南大学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